



张丽玲和《我们的留学生活》

“在拍了这部纪录片后，我变得更善解人意了，更爱……人了，是的，我从未如此不挑剔地爱过我们的同类。”

张丽玲

浙江人，曾从业于演艺圈，做过演员；1989年自费留学日本；1995年，获得日本国立学艺大学舞台导演专业硕士学位，就业于日本大仓商社食粮部；1996至1999年4年内，集资6400万日元，采访300多人，跟拍66人，消耗1000多盘磁带，拍摄完成10集电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该纪录片于1999年12月起先后在北京、上海、吉林、重庆、南京、凤凰等电视台播出，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记者 刘天时

记者：请您谈谈拍这部纪录片的原因和动力。听说您1996年是从一无所有的起点上，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开始拍片的。从筹集资金，找设备，请摄像，组织拍摄……到最终经历4年时间，完成这样一部低成本高认可的片子，历尽艰辛——在您成功的今天，各报争相追问您当年“感天动地”游说日本纪录片界著名导演和制片人横山隆晴的作风，或者渲染您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的狂热……但在您无人问津的当年，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您一分一秒的忍耐和奋斗的？

张丽玲：从理性的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认为这片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生活境况和内心状态的一个记录，从反馈给他（她）的国家的角度或是其本人的一段人生记录的角度，都是有些意义的；但这些反观而来的意义其实远没有我1989年初来乍到、在日本成田机场目睹的那一幕给我的动力大。那一幕我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做这部片子是我的一个梦想，那一幕就是这个梦想发生的因由。

那一幕是这样的：成田机场。出发前我在中国机场软磨硬泡了好长时间，才上了前往日本的班机。三个小时后到达日本，我还在想，好险啊，差点就没来成——命运是多么脆弱啊，虽然是个强硬的人，很多时候仍是无能为力啊……我一面多愁善感着，一面注意到一个来自我们祖国的中年男子——我不能不注意他，他是那样……他有多少个行李啊，带轮子的、不带轮子的，背的、挎的、拖的……大大小小，有九个之多，他为什么带这么多呢？吃的用的，没有安全感的人啊，他把能带来的都带来了……他在解行李的手都在抖，他穿得很整齐但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他有妻儿有母亲吧，他怀着什么样的想法来到日本的？……茫然、兴奋、紧

张……我们没有说话，时而对望一眼，时而各自茫然四顾——他和我一样还没有等到那个来接机的人。……直到如今，一想到“留学”，我的脑海里就是这幅画面。当时我就想，要是有一部摄像机，能把这个男人和他的行李放进（取景框）去，然后跟随他的脚步……

记者：在您1989年至1995年间初的日本留学生活是怎样的呢？您是否也要入语言学校，要打工以维持生活费和学费？您的住处，您的内心世界，您的苦楚、孤寂、信心和梦想，与片中的主人公类似吗？共鸣吗？您个人的经历与被拍摄者经历的这一层关系，给拍摄带来了什么？

张丽玲：基本与我的片中人物大同小异。出国前没有一定的目的，只是简单地想，要换个环境，人生很仓促，要给自己另一种经历，一定要！当时只是想出国，甚至觉得越南都会去。初到日本，我只语听都没听过一句。刚到那天，打开电视，叽里呱啦的，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我完了”。真是一样的又聋又瞎又哑，语言学校的入学表格都看不懂；一样的打工，虽然没洗过碗，但也端过两天盘子，主要是做模特，平面媒体的，矿泉水、净水器、化妆品、速食食品什么的，微笑就行了，但内心仍然是“不平衡”的——我是来日本卖微笑的吗？一样的蜗居，我和妹妹合住不过20多平方的小小的两居室；像李仲生（《我的太阳》中的人物）一样每天都有被解雇的危险，像陈辰（《彼岸的青春》中的人物）一样没人保障。……不过我可能幸运一些，没有（片中人物）那样极端。

因为这样的类似，我时常忘了自己是在拍摄，只是感觉在生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与过去同时存在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里面有我的生活，所以我会那么入迷，那么有直觉。**记者：**这部片子的观感之一是——为什么片中的人物言行举止那样放松，那样坦白，一点没有面对摄像机的紧张和造

哭了……拍纪录片心理真是很受折磨的……

记者：能细说这个“拍纪录片的心理折磨”吗？是来自被采访者还是拍摄的特别需要？

张丽玲：就那刚刚谈到的拍摄经历来说，李妻哭了，我真受不了，拉着摄像往外走——我多不好啊，人家好不容易一个团圆年，我却往痛处戳……摄像不肯放过拍摄机会，等我躲到外面擦干眼泪准备再进来，屋里传出了李仲生的歌声，《我的太阳》……

这种折磨主要来自被拍摄者的信任和自己拍摄需要的冲突。他们是那样无条件地向你敞开，而你，却……比如，我拍过一对国际婚姻的夫妇。拍摄之前我还在心里盘算如何引他们说出他们结合的真正原因——为了获得国籍，但是到了现场，他们没等你转弯抹角，就把什么都告诉你了，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他们坦荡的程度令我心情复杂。一方面，作为拍摄者，我为获得素材而兴奋；另一方面，作为他们倾吐的对象，我感到羞耻——我怎么能这样呢，人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跟你一个陌生人掏心掏肺，有利不利的都说了……他们或者根本不知道如果播出，那些对他们不利；而你呢，却在合计，这个能用，那个不能用，这不卑鄙吗？还有的被拍摄者，在做一些违法甚至犯罪的事，可是他们一点不防你，甚至告诉你，那么你拍不拍，用不用呢？……是你的片子重要还是他们的生重要呢？当然是他们的人生。

还有，我每次去丁尚彪（《家在我心中》的人物）家都带着摄像机，丁尚彪的爱人总是那么热情，我真有种罪恶感，想着哪天一定不带摄像机去。

我个人认为，把摄像机对准一个人，对他而言，首先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是怀着深深的歉意和感谢对准被

拍摄者的。

记者：能否以拍摄某一个留学生的过过程为例，讲析您做这部片子的方式和风格。比如如何发现这个人物，如何确定要拍摄，拍摄过程中怎样保持联络，拍摄现场与摄像是否发生过对拍摄方式的分歧……以及后期制作中，剪接的标准是什么，资料带与成品之间的比例……甚至拍摄中的趣闻，苦乐，……反正能体现您这部片子从制作到成品的特色的细节——特别的志愿者拍摄群体，异国他乡特别的拍摄环境，您和您的片子秉持的宽容悲悯的人文主义情怀……这些东西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他们是如何通过技术的物质的东西传达出来的。越细节越好。

张丽玲：拍纪录片是我的外行，对纪录片理论更无研究，但作为海外游子的一员，我特别关注每个到海外留学、实现梦想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境遇、内心世界和命运。虽然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这些形态各异的普通人在前仆后继，聚汇到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超越个别的大命运和时代情怀。以饱满的热情忠实地记录他们的变化过程，在他们生活的关键时刻，与他们一起体味人生，拍下他们的喜怒哀乐，捕捉住一个个感人肺腑的细节……以平视的角度，摒弃任何功利，与被拍摄者同甘共苦，共同思考人的梦、人的行动、人的细节、人的变化、人的命运……

我是个对人感兴趣的人，无论是人的善良、淳朴、美好和博大，还是渺小和狭隘，我都会把自己抛出去尽情感受，哪怕有时候心灵被炸得粉碎，但因为人所给你带来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和热爱，充实着整个世界，人生也因此而显得宝贵。可以说，我一直在有意识无意识之间寻找着人生的悲壮与绚烂。

记者：《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数家电

视台播出之后，不管是媒体还是观众都“反响强烈”，接受采访、签名售书……可以说是很轰动很风光。可是您在《自序》中提到，“一切都来得太迅猛，使我措手不及……有一种失控的感觉”，“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是不是有违我的初衷？”能否详述您的这种“疑虑”和“心理上莫名的抵抗”——您的初衷是什么，现在发生的在哪个角度上偏离了这个初衷？

张丽玲：意外的反响给了我很大压力，人们总是逼我讲述成功的原因，这让我很困惑。我很欣赏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对他们发现“宇宙不守衡定律”的描述：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夜晚，两个小孩子发现很远的地方有闪光，于是，他们就朝着那个方向跑去，结果发现了宝藏……李先生举重若轻的话的背后其实是巨大的劳作与艰辛。

记者：您说您喜欢片中的每一个人物。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为国为民的口号，也许只是为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梦想。您欣赏这样的人生奋斗吧。另外我看这部片子的体会之一是，片中人物在片尾比开篇时更可爱更朴实更成熟了，不知道您本人在拍片的这个时间跨度里，在这样一种生存、奋斗方式里，是否有类似的升华，谈谈您本人或您目睹的他人的这个化蝶的历程吧。

张丽玲：一个人，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做出这种决定，毅然背井离乡追求一个梦，并为此以人生为赌注，这样的勇气和决心，真是了不起。他们仿佛给了我一种战士冲锋陷阵的感觉，令我振奋和感动。他们比起那些要么好高骛远要么轻易放弃以悲观沮丧害社会的人要可爱要令人尊敬得多。

我个人……我变得更善解人意了，……更爱……人了，是的，我从未如此不挑剔地爱过我们的同类。

